

“理蕃政策”与山地殖民掠夺

崔晓阳 (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【摘要】1895年至1945年间,日本在台的殖民政府——台湾总督府,对台湾进行了疯狂的殖民掠夺。台湾原住民地区多为山地,而山地丰富的林业与矿产资源就成为日本殖民掠夺的重要方面。台湾总督府的“理蕃政策”与山地殖民掠夺密切相关。

【关键词】台湾;山地;理蕃政策;原住民;殖民掠夺

【中图分类号】K25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009-8267(2013)03-0181-02

一、日据前期的“理蕃政策”与山地殖民掠夺

台湾总督府的“理蕃政策”始自日本据台之初。日本攫取台湾后,岛内广大平原的汉人抗日活动蜂起,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镇压抗日运动,对原住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。日据初期总督府的“理蕃政策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^{[1]216-217}:

(一) 1895~1901年,这一时期内总督府以镇压汉人地区的抗日活动为主,对原住民地区则采取怀柔政策,防止汉人与原住民共同抗日;

(二) 1902~1909年,这段时期汉人的武装抗日基本被镇压下去,总督府逐步对原住民采取攻势,推进隘勇线,并加紧所谓抚育的政策,采用两面手法,同时加强对“蕃地”的调查,为掠夺山地资源做参考;

(三) 1910~1915年,总督府全面落实对原住民的高压政策,封锁原住民聚居地区,限制汉人入界,原住民也不能随意下山。

简单地说,总督府的“理蕃政策”有镇压和“抚育”两条主线。1895~1901年,总督府对原住民采取怀柔政策,这不过是因为殖民者面对抗日烽火,尚无余力对付原住民而已。在镇压政策中,总督府首先沿用清代的隘勇制度。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时,清代遗留下来的隘寮有80所(民设5所),隘丁1758人(民隘40人),隘路160华里,因割台而撤废官寮^{[2]695}。因殖民当局尚未顾及“番政”,故当地士绅私设隘寮,到光绪二十一年底,有民隘131所,隘丁568人^{[2]695}。第二年,隘寮和隘丁转归官有。其次,是对原住民施行残酷的赏金猎首制度。宜兰厅长佐藤有熊曾鼓励警员、隘勇和保甲民伏击“蕃人”,杀死头目者赏金100元,杀死藩丁者赏金50元^{[1]211}。殖民者的赏金猎首制度造成不少原住民无辜被杀,而行凶者反得勋章^[3],这与当年欧洲殖民者在北美猎杀印第安人毫无二致。总督府的镇压政策还体现在军事镇压和收缴原住民武器方面。

1902~1930年间共收缴原住民枪支28900余支,子弹49000发^{[1]214},对不服从的原住民则予以“讨伐”。

“抚育”方面,除一方面用酒、肉、零钱收买外,总督府还曾经对原住民施行“授产”政策,即向原住民传授农业、手工业等方面的生产技术。乃木希典统治时期(1896年10月~1898年2月),始制定授产政策^{[2]633}。但授产政策到1900年才开始真正执行^{[2]864},该政策真正有效的执行是在佐久间总督(1906年4月~1915年5月)的大规模武力镇压之后^{[2]843-853}。也就是说,有成效的授产政策执行,是在1915年之后。

总督府对“蕃地”调查颇为详尽,1901年成立的“台湾旧惯调查会”,于1909年成立“番政科”,出版有《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蕃族调查报告书》(8卷)、《蕃族惯习调查报告》(5卷)、《台湾蕃族图谱》(2卷)、《台湾蕃族志》《台湾蕃族惯习研究》(8卷)等^{[1]221}。

上述详尽的调查研究难道是为了保护台湾原住民的文化与经济吗?答案是完全否定的,这些调查研究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总督府掠夺原住民提供参考罢了。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曾经露骨地说道“若欲拓殖本岛,非先驯服生番”^{[4]2},第一任民政局长水野遵则说得更具体:“……(台湾)樟脑之制造、山林之经营、林野之开垦、农产品之增殖、矿山之开发,对内地人(日本人)之移居,无一不与蕃地有关。台湾将来之事业尽在蕃地……”^{[4]3}由此可见,掠夺山地资源才是“理蕃政策”的终极目的,对原住民的调查如此大规模执行,与总督府的这个政策方向紧密相关。

原住民居住地的资源向来归原住民所有,清廷对此曾采取多种措施予以保障,但日本殖民者却使用法律手段予以剥夺。1895年10月,总督府颁布的《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》,该法令第一条规定“无官方证据及山林原野之地契,算为官地。”第二条规定“台湾交接以前,除有清国政府之允准执照者外,一概不准民人采伐官地之树木及开垦官地。”^{[4]8}如此一来,原住民世守的山地被

【作者简介】崔晓阳(1980—),男,河北藁城人,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台湾历史。

剥夺干净,而殖民者则可借“官有”之名对山地的各种资源进行大肆掠夺了。

总督府对山地掠夺的资源包括:樟脑、森林、矿藏和人力资源等。

1906年6月,总督府设立樟脑专卖制度,官设樟脑局,垄断樟脑、脑油的收购与出售。根据统计,1897年台湾出产樟脑700万斤,加上日本国内生产的200万斤(其中150万斤是从台湾进口300万斤粗制樟脑精制而成),共输出900万斤,造成国际樟脑价格的暴跌^{[4]83-84},显示出殖民掠夺的贪婪。

总督府对山地森林的掠夺也相当惊人。1899年,总督府发现了阿里山大森林。日据时期由于过量开发,台湾的森林面积从最高峰的1926年2158521公顷减少到1942年的172926公顷,减少了近90%^{[1]227}。

总督府对山地的掠夺还包括矿藏。山地的矿藏中以煤矿为主。1897~1942年间,台湾矿区由20个曾加到331个,采煤量有19275吨增至1913937吨^{[1]227}。

总督府还对原住民的人力资源进行了压榨。日本殖民者强迫原住民从事修路或在警察机关从事劳役,如果这些劳役适逢狩猎、耕种季节,则原住民的损失颇为惨重。另外,殖民者给服劳役的原住民报酬极低,根本不足以糊口,而这点可怜的工资还要被强扣一部分做“义务储金”。^{[2]873}

二、“雾社事件”后“理蕃政策”的调整

总督府的“理蕃政策”对原住民在政治与军事上施行压迫,经济上残酷压榨,这必然会引起原住民的反抗。1930年10月27日,爆发了“雾社事件”,事件中原住民杀死日本人134人,伤250人,误杀台湾人2人^{[2]877},这是当地的赛德克人专门针对日本人的一次大规模反抗。

“雾社事件”的爆发,虽然殖民者凭借飞机、毒气弹等武器战胜了当地的原住民,但却暴露了总督府“理蕃政策”的失败,对此总督府对原住民做了更详尽的调查。1928年,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土俗人种学研究室,该研究室于1930~1933年对原住民展开了系统的调查,该研究机构至光复前出版的著作有《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》(移川子之藏)、《未开社会之家族》(冈田谦)、《原语高砂族传说集》(小川尚义、浅井惠伦)、台湾蕃族之烧烟农业》(奥田畴)、《高砂族住家研究》(千千岩之助)、《台湾原住种族之原始艺术研究》(佐藤文一)、《祀壶之村》(国分直一)和《高砂族调查书》等^{[1]222-223}。

总督府第二次对原住民的调查研究成为政策修改的参考。因此,总督府调整了“理蕃政策”:一、加强教化,安定生活;二、加强对原住民风俗调查,并以“番人”生活实际制定政策;三、以“信”“望”指导“番人”,征劳役应考虑原住民生活状态;四、矫正原住民弊习,加强简单生产知识传授,并利用“头目势力者会”等加强统治;五、加强生产指导,但要注意“勿致压迫其生活情事”;六、以素质高者充山地警察,提高警察待遇,不轻易变动执勤地点;七、加强交通建设,以有利于“教化”;八、提供医疗救助^{[2]879-882}。“理蕃政策”的调整只是剥削形式的调整,殖民者对原住民地区的经济掠夺本性并无丝毫改变。

三、“理蕃政策”与清代原住民政策的对比

岛内部分“台独”学者将清代的原住民政策刻意描绘成“殖民”政策,似乎与日本殖民者并无两样,但事实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。

首先,日本“明治维新”后发展为带有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国家,并因其侵略性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。日本攫取台湾后,将台湾经济的各方面进行了资本主义化^[5]，“理蕃政策”的终极目的是为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掠夺资源。清朝则是封建政权,意识形态与日本完全不同。清代治理台湾的基本方式是消极的,并没有以政权为主导谋取原住民地区的各项资源。虽然刘铭传曾在台主持部分“洋务”,但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防^[6]。

其次,清廷与日本治台政策中的民族感情成分不同。清廷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秉持的统治理念是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,天下民“皆我赤子”,这当然也包括原住民,因此清廷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做了很多工作^[7]。资本主义化了的日本殖民政府,占据台湾就是为了利润,在心理上并没有将原住民平等相待。日本占领台湾初期,因高额的占领成本曾想将台湾倒卖,这正是基于资本家“成本”与“利润”的算计,其后台湾未被倒卖,是因为殖民者加强经济压榨的结果,而原住民地区的经济掠夺为提高殖民“收益”贡献颇多。在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,“番人”是野蛮的,而自己则是“文明”的,因此否定“番人”的基本人格和尊严,掠夺“非人格”的“番人”是没有任何感情负担的。简单地说,“理蕃政策”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掠夺山地资源,对原住民是没有任何温情可言的。

四、结 语

台湾总督府在台湾的“理蕃政策”,形式上以镇压和“抚育”原住民为主。殖民者对原住民经济上残酷压榨,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,最终激起激烈反抗。“雾社事件”后虽然总督府对“理蕃政策”进行了调整,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并没有变化。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这其中包含着政策中不同的民族感情成分,在批判“台独”历史观时,厘清这一点很重要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陈小冲.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[M].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5.
- [2] 温吉.编译.台湾番政志[M].台湾省文献委员会,1999.
- [3] 王学新.“杀蕃赏”之研究——以竹苗地区为例[A].第三届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[C].台湾省文献委员会,2001.
- [4] 藤井志津枝.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理蕃政策[M].台北: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,1989.
- [5] 矢内原忠雄.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[M].周宪文,译.台北:海峡学术出版社,1999.
- [6] 张世贤.晚清治台政策[M].台北:海峡学术出版社,2009.
- [7] 李祖基.论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政策[A].台湾历史研究[C].北京:台海出版社,2006:307-326.

(责任编辑:千雅)